

思念集

陈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思念集

陈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念集 / 陈琳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35-9696-1

I. ①思…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377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黎新  
责任编辑 张玉青  
封面设计 锋尚设计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696-1  
定 价 6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mailto: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mailto: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96960001

# 目录

前言 / 1

怀念周培源先生 / 5

忆季羨林师 / 14

纪念王佐良先生 / 24

忆佐良师 / 24

逝后——忆王佐良师 / 80

在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 83

忆珏良 / 85

忆裕光校长 / 98

与明经老师相处的日子 / 110

悼瑞源老友 / 123

忆素我大姐 / 124

念艾培 / 131

怀念大卫·柯鲁克 / 147

纪念索尔·艾德勒 / 165

Sol Adler, a soulful friend / 165

在艾德勒同志追思会上的讲话 / 172

纪念帕特·艾德勒 / 175

In memory of Pat Adler / 177

*China Daily* and I — In memory of my old friends  
at the paper / 179

怀念我的哥哥陈忠经，并忆“后三杰” / 195

扬眉雪耻日 忧民爱国魂 —— “密苏里号”舰上的受降与  
徐永昌其人其事 / 213

纪念丁宝桢 / 232

晚清重臣丁宝桢：为官一生勤为民 / 232

The man who gave us Gongbao chicken / 239

莎士比亚和他的环球剧院 / 249

二百二十年了，想起彭斯 / 259

纪念保罗·罗伯逊 / 270

保罗·罗伯逊生平 / 271

The life of Paul Robeson / 276

在保罗·罗伯逊纪念会上的讲话（节录） / 285

Speech at the Paul Robeson Memorial (Abridged) / 287

后记 / 290

作者简介 / 292

# 前言

顾名思义，“思念集”就是思念故人的文字。

人老了，不免怀旧。近年来，常常忆起先后逝去的授业者、前辈哲人、同辈亲人、国际友人、老同学，甚至包括长年敬慕不忘但未曾有幸谋面的中外人士。

我多年来的一个毛病，就是上床后不易入睡。于是，与这些作古人们相处的时光就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有时竟会勾出来一些平日绝不会想起的极为细小的往事，令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些逝者生前都曾为人们作出过各种不同的奉献。他们之中，有自己不愿如此被称呼的大师巨匠，有曾为人类进步事业出生入死过的革命前辈，有曾为人类文化事业留下永不会被忘记的珍贵遗产的文化人，有给了我良好教育使我今天还能为人们做点事情的大学校长和老师，还有国际友人。

我之所以决心写下这册《思念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确不时念着他们，而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这些人的事迹是值得除我之外的更广大的人群怀念的。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曾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人们，但我不曾有机会和幸运同他们相识或相聚。我今天在这本《思念集》中记下的，是我自己亲身有过接触或曾有过神交的人们。

同时，我又必须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要记下他们，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他们之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曾在一些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受到过某些不公正的待遇。我自己作为一个友人，虽然不曾对这些故人做过什么今天应当感到亏心的事，但总觉得应当有个什么机会来对他们表示些歉意。以本集子中写到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为例。在1937年，他就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演唱会上用中英文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将募捐所得通过宋庆龄先生转给中国人民，以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在1949年10月1日，当他在罗马旅途通过广播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消息时，就拉起朋友走上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然而，这样的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在20世纪60年代初表示想到中国访问时，只是因为他在此前曾到赫鲁晓夫任最高领导人的苏联访问，就未被邀请前来中国。这使我多年来觉得，我们中国人欠了这样一位朋友一个人情。这也正是

我在2008年发起组织了一次纪念罗伯逊的活动的原由。在这个《思念集》中，我把当年我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也包括进来了。

又如，集子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位台湾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的纪念文章。我在写时，虽了解这位将军一向对我党抱有好感，而且亲民，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件事情涉及微妙的关系。文章送到《光明日报》后不久得到回音，说这篇文章须送到“上级”审核。过了约半个月，我得到报社总编室回复，说上级同意原文照发，而且将我原送去时的题目作为副标题，正标题改为《扬眉雪耻日 忧民爱国魂》。对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给予这样的肯定，也是很寻常的事。因此，我也决定把这篇文章转载入《思念集》中。

这些文章不少是在报章上刊登过的，它们当时的读者，不论是前辈、师长、同窗或亲朋，都曾向我表示喜爱，都曾说我在文章中倾注了感情，并都曾说它们值得保存下来。应该说，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当初我写这些文字，以及这次为这集子而新写的，的确是出自对这些人物的敬慕和思念，是动了情的。

说得多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一看这个集子里所涉及的人们，是不是值得我们今天来思念呢？



# 怀念 周培源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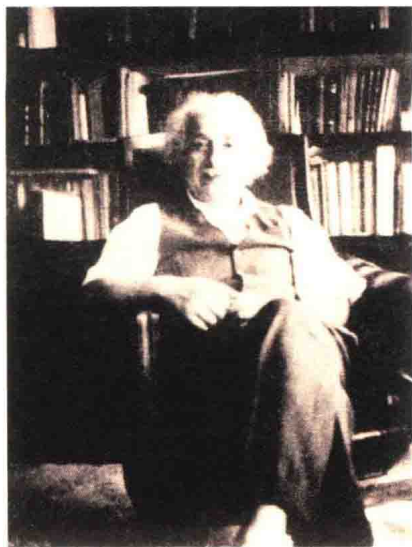
2017年8月28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巨匠周培源老先生115岁冥寿。我邀请了他的年过80岁的女儿周如雁和周如玲两位多年好友来家小聚。我们举杯怀念这位中国唯一曾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的物理学大师。

说起周老，当今除了孩童不知其名外，应当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学校物理教科书里有对他的介绍，更不用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了。他不仅是中外闻名的科学巨匠，还是伟大的爱国者，政治立场鲜明的社会活动家，国际知名的世界和平积极推动者，曾在国际上被尊称为“红色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和平老人”。他在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科学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士之一。除曾担任国内外多个科学研究机构的创始人或领导者外，还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老应当说是一位终身的教育家。他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先后在美国、德国、瑞士的著名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年方二十七就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当时周老年轻潇洒、风度翩翩，又加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学校里上百位教授中被美称为“三剑客”之一。他对小不了他几岁的学生爱护备至，尊重他们的勤学苦读精神，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学生应该超过老师”。又经常引用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钱三强、

钱伟长、林家翘、胡宁、于光远等。周老直到90岁高龄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在他近70年的教学生涯中，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几代人才。



1937年周培源  
为爱因斯坦拍摄的  
照片

说起周老与爱因斯坦的相交，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1936年，周老在清华大学连续从事教学工作6年之后，得到一次休假的机会。于是，他决心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一起继续深入研究相对论。周老不仅对爱翁的科学成就衷心景仰，而且对他的反法西斯勇气和精神也十分敬重。但是，他并不盲从权威。他在总体方面肯定相对论理论的同时，在其中的“坐标意义”问题上，对爱翁的见解有所保留。而爱翁

是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完全没有为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此不满。相反，他将周老的意见纳入自己的思考之中。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周老如何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为人处世中实践着自己的座右铭：“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在追忆周老一生的事迹时，不能不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正确立场，直面“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大无畏精神。周老在1993年11月去世后，《人民日报》于12月5日发表了《周培源同志生平》一文。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看到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备受摧残，痛心疾首。在“四人帮”当道、极左思潮肆虐的环境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科学真理，捍卫人民教育事业，坚决抵制对相对论的批评，反对所谓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呼吁加强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上书周恩来总理，受到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1972年10月6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针对“四人帮”的种种怪论，提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要抓好基础课的教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泛滥的极左思潮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科学家实事求是、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捍卫真理的崇高精神。他的女儿周如玲对老父为人的三个字总结是：说真话。

这一精神还可以从另一件事看出来。在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大坝时，科学家们对于这一巨大工程有着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形势，肯定的意见几乎一面倒。然而，周老作为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专家，对于修建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看法的。1988年，86岁高龄的周老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到选定的建坝地段以及湖北、四川长江流域作深入细密的考察，并上书中央缓建大坝。他以一个有良知和无畏胆略的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提出：“关于大坝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今天，大坝已经建成十多年，在利用水力、广开电源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但在生态环境等方面也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它的是非功过将由更长的历史来判定。但是当年周培源同志那种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畏遭批的危险、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我对周老早存景仰，也曾听过两三次他的讲话和报告。同时，“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哥哥陈忠经曾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工作中与周老联系较多，逐渐建立私交，因此我也见过周

老几次面。但由于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不同，且我又是晚辈，早年无缘深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周老二女周如雁女士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担任新闻纪录片英语版的解说工作。有时某些新闻报道片或纪录片需要双人对话配音时，该厂就邀请我参加录音，如此就与周女士相识并合作，逐渐成为好友。由于她的引见，也出于我对她老父的景仰，我逐渐常去周府走动。周老夫人王蒂澂女士是位英语老师，因此与我也多共同语言。这样，我就有机会在家庭场合亲近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一位普通人的周老。

周老曾在美、德等国留学和工作多年，因此外语非常好，尤其是英语；而且他也很喜欢英语，谈话中常常插用英语。因此，我去看他时一起聊天，也很相投。他因从女儿那里知道我是英语报纸《中国日报》的顾问，而他平日是爱看该报的，因此就爱与我谈《中国日报》里的英语有时“不地道”，常常会有“中式英语”之嫌。他说，由于中外各种文化、环境，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差别，有时一个中国概念要翻成外语，既要传达原义，又要符合外国语言特色，是会有困难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我至今难忘的。他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美国时，一次谈起中国的历史，谈起孙中山先生，谈起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他说，要把这个概念像汉语那样简明地翻出来使他大伤脑筋。

他说，“民”当然可以翻成people，但“三民”怎么办呢？他说，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他上中学时英语读本里选有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是他当时几乎能倒背如流的。里面最后一句是“...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他把这句话背给美国朋友听，他们立刻明白了“三民主义”的意思。但周老说，要用几个英语单词翻出“三民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汉译英的确是个大学问。这些有关英语的事，就成了我们见面时经常谈论的话题。（这里要说明一下，《中国日报》创办于1981年。早期存在一些“中式英语”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发展至今，这个问题早已不复存在了。）

另外一件我们见面常谈的事是北京大学。谈天中，我告诉他我的三个孩子（二男一女）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他听了说，“一家三北大”好像还没听说过。而且我告诉他，三个孩子中两个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他听了尤其高兴。周老从1952年到1981年，在北京大学除任教授外，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常说，这三十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enjoyable的一段时间。而且，除教大学生外，他特别喜欢孩子。他常说：“科学家要从孩子抓起。”在他自己的孩子们小时，他就喜欢给她们买一些或设计一些带一定创造性

的玩具。同时，在家里也爱同她们说些英语。



周培源与他的“五朵金花”全家福：前排左为夫人王蒂激，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长女周如枚、二女周如雁、三女周如玲、小女周如莘

平日，周老对自己的孩子家教甚严，同时又亲爱有加。对妻子则更是一位体贴关爱、老而弥亲的丈夫。上世纪30年代后期，王夫人不幸患上肺病，不得不住到西山疗养院医治休养。当时周老工作正忙，还必须独力维持家务，照料孩子，但他每周末都骑自行车二十多里去医院看望夫人。由于医院制度严格，不准与病人接触，以防病菌外传，周公只能踏上凳子隔窗看视亲人。而尤为感人的是，约在1987年，周老夫人患中风而瘫痪，长期卧床，只能单独住在一间屋